

# 从“时光边缘”走出的村落

——变迁视角下地扞侗寨的文化遗产与嬗变

李玉婷、何影<sup>1</sup>

**摘要：**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社会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对于一个少数民族地区的普通村寨而言，他们也从来不是这场“变局”的旁观者。本文以地扞为侗寨典型代表，运用田野调查所获取的第一手资料，描绘在歌师、“博物馆”和“建房风波”三个维度中反映出来的文化遗产与嬗变，呈现变迁视角下这个侗族村寨所面临的困境。并指出，以“传统—现代”两分法来阐释不同文化的碰撞难以避免“文化中心论”的嫌疑，因而在文化整合的过程中如何权衡二者的关系，仍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关键词：**地扞、侗族、转型时代、文化变迁、田野调查

## Villages Coming out from the Edge of Time

——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evolution of Dong (a Chinese minority) villages in a changing view

Yuting Li, Ying He

**Abstract:** Chinese society are faced with a drastic change that have never happened over the last millennium because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For a common village in the minority area of China, they have never been the spectator of this changing time. This article takes the Dong village as a typical example, and uses the first-hand information from the fieldwork, to describe the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evolution in three dimensions: masters of songs, museums and house-building issues. Thus we present the difficulties that the Dong village is faced with in the view of social change. Then we point out that it is hard to avoid the suspicion of cultural centrism if we explain cultural collision using dichotomy of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So it remains to be a question that how we should tre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i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combination.

**Keywords:** Dimen Village (Guizhou Province, China), Dong, Transforming time, Cultural change, Fieldwork.

---

<sup>1</sup> 本文为2016南京大学暑假社会实践团队“地扞田野小分队”的成果之一。主笔为项目负责人李玉婷（社会学院2015级本科生），成员何影（历史学院2015级本科生）写作第二部分第一节。

## 一.

## 引言

2008年5月,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出版了中国特刊,并刊登了美国著名华裔女作家谭恩美在贵州黎平县地扞侗寨体验生活后所作的文章:《时光边缘的村落》。在近六百年的历史里,这座古寨静谧地掩埋在崇山峻岭中,相对隔绝的自然环境使得其文化风俗、社会结构、生活传统等方面依然保留着许多令现代快节奏的都市人惊叹的“边缘感”——似乎,这里的日子像溪流,在雾霭环绕中以超脱时间的缓慢速度流淌着。然而,在这篇文章发表后的八年后,当我们重新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去探寻这片土地时,不难发现:在整个中国近四十年来的社会转型大背景下,地扞侗寨——这座位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边陲小镇——从来都不是“时光边缘”的旁观者,它真实的参与着中国社会的变迁,它也真实的反映着文化之间的碰撞和民族文化的嬗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机制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其文化面临着外来和现代的双重交融和重新整合(刘宗碧,2008)。

在前人关于侗族的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研究中,其主要关注点和兴趣多集中在不特定聚落的整体性反映,以追溯和理解某个特定视角、特定时间点下侗族文化的内在逻辑和结构为主要取向,如在对侗族传统婚姻的研究方面,有学者提出尽管相较于汉族传统婚姻文化,侗族青年男女在恋爱方面更加自由,但其关于房族、婚姻圈和层级婚亲规约的限制体现了社会控制和侗族严密的社会结构(曹端波,2008);而在另一位学者关于侗族标志性建筑鼓楼的研究中,则提到了该建筑所反映的“鼓楼社会”,表现了典型的家族社会特征(王良范,2002)。然而,在前人的著述中所描绘的侗族社会与我们在田野的探寻中发现的那个侗族村寨,却有着诸多不同甚至相悖的文化习俗,而在关于少数民族文化变迁的研究中,我们很难找到关于这种转变的叙述。然而,当代社会转型的大背景对侗族文化的影响之巨大,已经直接反映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在研究侗族民俗文化、制度文化、建筑技术等方面,前人为我们建构了大量的理论图景,但在实证研究尤其是田野调查方面,则缺乏变化的眼光。因此,呈现一座当代转型语境下侗族村寨所发生的转变,或许能回答人们在理解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变迁时所遇到的一部分困惑,能够弥补少数民族文化人类学在“中国经验”研究的空白,而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价值标准下,找到侗族文化传承机制的新可能。

## 二.

## 地扞侗寨的相关背景

### (一)“前世”历史文化探源:汉、侗民族融合之处

侗族作为中国五十六个少数民族中的一员,据大多数说法其族源与百越族系中的一支——骆越有一定渊源。分子人类学通过分析染色体遗传标记,认为距今万多年前,一支黄种人带着遗传突变从越南、广西方向进入中国,分布在越南北部的交趾到江浙一带,形成为百越民族。“越”作为族称始于商代,因其支系众多,战国末期又被称作“百越”。对百越及其后裔的称谓见诸文献的除“越”

外，还有夷、夷越、蛮夷、叵、理、僚等数十种。<sup>2</sup>据考，古骆越人有断发文身、嗜食水产、习用舟楫、长于水站的特点，显然有吴越儿女之风，南宋文人周密的《观潮》一文用生动的笔触描绘了出没于惊涛间的吴儿：

“吴儿善泅者数百，皆披发文身，手持十幅大彩旗，争先鼓勇，溯迎而上，出没于鲸波万仞中，腾身百变，而旗尾略不沾湿，以此夸能。”

侗语与台语支、侗水语支、黎语支和仡央语支的各种语言同属侗台壮侗语族，都来源于古百越族语言，侗语与古越人语言在语音、语法、词汇上能够找到一些相同或相似的地方。而侗语与僚语的关系则更为密切，据《广西通志》卷引《庆远府志》记载僚人语言的几个词汇，与侗语词汇进行比较后可看出它们有类同性。如僚人呼父曰“爸”，侗语既叫“爸”，也叫“卜”；僚人称母亲为“乃”，侗族也称“乃”。甚至还有完全相同的词汇，如都称弟为“侗”、穿衣为“登苦”等。<sup>3</sup>

侗族没有发明创造出自己的文字，却有独特的记载历史的方式和载体——古歌。侗族人民用歌声叙述民族的繁衍、祖先的迁徙、村寨的形成，记录侗族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sup>4</sup>在实践小组所调查的地扪，依旧传唱着关于地扪先人的侗歌《千三祖宗歌》：唐朝末年至宋朝时，先人为躲避战乱便从浙江、江苏出逃，辗转至江西，后来到贵州，最后定居地扪。由于祖先选地址能够瞻前顾后，才得以人丁兴旺，而最早在秦朝时，便有先人为了躲避秦始皇的暴政而来到地扪。

有文字记载的关于侗族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宋朝，对于地扪的记载最早是南宋理宗时期，在那时中原王朝已经将这个偏远村落纳入到政治体系中。<sup>5</sup>然而由于中原王朝固有的“蛮夷戎狄”之观，汉人对待当地土著的态度也许不见得友好，当地多有叛乱。简而言之，在宋朝时，大量汉人迁徙、定居贵州，或为躲避战乱、或为开发土地、或为朝廷征派平乱，于是当地人与汉民族的交流日益渐深。地扪流传的关于唐公祠的故事，传说唐公祠是为了纪念一位不知从何而来的唐姓少年，他教当地人读书写字，进京赶考高中后心念故居，死后阴魂重归故里。这个传说也许就是汉民族与侗族之间的交流、融合的写照。

## （二）“今生”地扪侗寨

“地扪”一词来自侗语的汉语音译，意为“泉水发源的地方”，而寨中也正有一条蜿蜒的小河流过，最终汇入清水江。从贵州省黔东南州黎平县出发，需要乘坐约一个半小时的汽车，并徒步五公里才能到达地扪寨——全国仅次于肇兴的第二大侗寨。不同于肇兴的是：由于交通的不便、基础设施的不完善、游玩项目单一等等因素，地扪寨的旅游业发展一直处于比较尴尬的状况，尽管早在

---

<sup>2</sup> 廖君湘：《南部侗族传统文化特点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兰州大学民族学系，2006年，第23页。

<sup>3</sup> 石开忠：《试论侗族的来源和形成》，《贵州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

<sup>4</sup> 张姗：《贵州地扪侗寨的历史地理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历史地理系，2009年，第13页。

<sup>5</sup> 同上书，第8页。

多年前寨子就已经声名远扬至海外，却始终少有人问津，但不得不说，这也正是我们选择其作为侗族文化风俗研究对象的原因之一。整个地扪侗寨由五个自然寨组成，最大的寨为芒寨，其余分别为母寨、模（mú）寨、寅寨和围寨，寨与寨之间几乎没有严格的界限，被小河隔开的村寨由五座风雨桥连接。

地扪寨里居住着五百余户村民，共2300多人口，其中约98%的村民都姓吴，在当地采访中得知，除吴姓外，地扪还有李、段、刘等姓，这些外姓人家几乎都是清代以后从湖南附近迁来的汉族，他们在生活习惯、日常服饰上仍与当地入略有差别，但登记在册均为侗族。根据学者的研究，侗族社会有一套较为完善的社会组织，形成了一整套较为严密的控制网络，有“姓”、“兜”、“基”、“公”、“然”等层层递进的家族组织，在传统汉文化中严格的“同姓禁婚”，在侗族中却并不成为禁忌，但“兜”（即被认为是具有血缘关系的房族）内是禁止通婚的。在当地采访中了解到：地扪寨的五个自然寨分别为五大房族，族内吴姓严禁通婚，但特定的寨与寨之间的吴姓可以开亲，并建立有一种传统的婚姻关系，当地叫“结对门亲”，在过去，地扪寨的男女青年通常会选择寨中的不同房族互通婚姻，较少与外开亲，但我们也在采访中发现，这种传统的婚姻规约或许也正在一步步被解构。

### 三、来自田野的调查报告：歌师、“博物馆”和“建房风波”

#### （一）研究背景和方法

该项目的选题来源与其说是灵光一闪，不如说是深埋于组员心中已久的情结的突然召唤——尽管组员几乎都是少数民族土地上孕育出来的子女，但我们对自己文化的脉络似乎都有些模糊甚至陌生，当然也就没有思考过这些少数民族民俗文化之于人类学的意义，正是由于这份从“场域”中跳脱出来、以“他者”身份重新审视自己的眼光，促使了选题的成型。我们以地扪侗寨为具体研究对象，运用文化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去往当地进行实地调查，通过对寨中十数位重要人物——歌师、寨老、巫师、造纸手艺人、侗歌队等——的访谈，结合民族学、社会学的方法，探讨侗族文化在变迁视角下的现状与嬗变。

#### 一、歌师：不被承认的徒弟

在车上颠簸了一天，我们在傍晚时抵达了地扪寨，在此之前我们就已经听说，如果想要了解当地侗族的风俗文化，有位老人是一定要去拜访的，那就是“歌师”——吴胜章。歌师今年已经七十岁了，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也是黎平县最好的侗戏师之一。于是第二天下午，我们出发去往歌师家中。

2009年，侗族大歌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一时之间，世人对这种多声部、无指挥、无伴奏、自然合声的民间合唱形式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不少背包客去往与黎平县毗邻的从江县小黄村，只为听一场侗歌。而在地扪，来拜访的人却鲜少是游客，“来找我的人很多，有贵阳来的老师，也有北京来的老师，甚至还有外国人”，吴胜章说到这，向我们指了指身后，“有相片哩”。那

些照片有些泛黄破损了，但依然被很精心的装在带玻璃面的相框中，挂在木房的墙上——这是歌师工作的二楼阳台，采光颇佳，他面前摆着一张桌子，上面是厚厚的歌本和剧本，无数侗歌侗戏的创作和翻译就是在这里完成的。

吴胜章从1966年开始编侗歌，那年他不到二十岁，那年也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年。“67年我就当师傅了，自编自演，都是编新的，不是旧的”，村里的侗歌都变成了“新侗歌”，只有吴胜章的公公和伯公将旧的歌本抄了一份保存下来，据说那是侗戏鼻祖吴文彩的歌本，今天已然是个宝贝。那时吴胜章在黎平县读中学，从自己不识字的伯父（一位侗戏师傅）那学会了侗戏的编排，并开始将他创作的侗戏写成了汉字记载下来——长久以来，侗戏的传承仅靠老师傅的口授，并不似侗歌那样还有歌本。

对侗歌侗戏的钻研让吴胜章在侗族人中的名气越来越大，48岁那年，他收了自己第一个徒弟。

在地扪，几乎年轻一代都是吴胜章的“弟子”。从黎平县回到地扪寨，他做起了寨里小学的老师，在课外也教学生们唱歌。在普通侗族人的日常生活中，侗歌的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铭刻了他们对祖先历史的记忆，比如《千三祖宗歌》、《唐公歌》和《祖母神歌》；也还是通过侗歌，教会孩子吃饭的规矩，田里的活计，还有无私的可贵和贪婪的卑劣。在侗歌的代际传承中，吴胜章已经是地扪人的“老师”，可即使是跟随他学了十年的侗歌侗戏，但也不一定是“徒弟”。“如果不会编，不会导演，那他就不是徒弟，他是演员，演员不算徒弟”，吴胜章非常严格，成为真正的“歌师”实际上还需要加上“戏师”的标准，要能把歌和戏结合起来，能创作、编排、导演、乐器、唱歌、表演。获得吴胜章承认的徒弟屈指可数，吴胜华算一个，吴胜华的弟子吴章和算一个，他们都能编歌会排戏，识汉字。

歌师边和我们聊天边做着歌本戏本的整理，将记忆中的侗歌歌词写成“白眼字”（一种用汉字和字母来表示侗语的方式，近于音译），把歌词大意写成汉字，他的右眼因视神经萎缩已接近失明，左眼的视力也在一天天下降。在他那里，侗歌和侗戏的题材完全超出了我们原本的想象：就侗歌而言，有约十个主题，分别为反腐倡廉、纪念伟人、校园歌曲、千三祖宗、情歌、生活日常、节庆祭祀……；而就侗戏而言，有对《白蛇传》的改编，有根据电视剧里的某个桥段而启发的新创作，有勉励后辈上学读书的“孟母”故事……“爱情、劳动生产、日常生活都可以写歌，就像你们今天来这里拜访我，也可以写”，吴胜章老人这样告诉我们。无论是侗歌还是侗戏，其具体的内容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侗族传统地理历史文化的呈现，更多的体现出由于与外界交流的增加和碰撞的再整合，这种整合的基础是现实生活的转变，是切实发生在这座村子中的生活生产方式、经济基础、教育制度的转变。

2002年，地扪村通了电，当地村委会给村民装起了接收电视信号的接收器，人们逐渐接触到了电视、广播、手机，在十余年的时间中，地扪寨村民的娱乐方式和娱乐活动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村民获取的信息迅速增加。一方面，这意味着一种非常不同于他们的生活方式至少通过媒体呈现在了村民的眼前，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那种安于土地的耕种无法令他们感到满足，于是选择直接走出“边缘”；另一方面，年长的人仍守护着土地，却不见得守得住其他。由于

信息资源占有的代际鸿沟，在这场不同文化之间的“拉锯战”里，他们可能正处于劣势，在传统林业稻作经济和工业经济的角逐中，侗歌侗戏赖以生存的文化、经济、自然环境，可能正面临挑战。

在我们临走之前，吴胜章感慨说，年轻人已经对侗歌侗戏不感兴趣，而能继承他全部技艺的接班人，还未找到。

## 二. 地扪寨的“博物馆”：记录者或闯入者？

在地扪寨，“博物馆”是一处非常特殊的存在。

那是座乍看上去与侗寨建筑风格非常接近的建筑群，隐于河流下游岸边的竹林里。2005年1月8日，贵州省黎平县地扪侗族人文生态博物馆建立，这是中国第一个民办的生态博物馆。所谓生态博物馆，学界一般认为是指一种建立在保护当地自然与人文基础上的、展现某个民族文化的实地村落或模型村落。就此而言，其实整个地扪寨以及周围的腊洞、罗大、登岑、额洞五个村均属于“千三”侗族文化生态博物馆区，而村民口中的“博物馆”，是指用于收藏资料、接待学者、研究分析的研究中心，但在村民眼中，这座“博物馆”的意义不仅仅在于那些造型上结合了现代元素的干栏式建筑，更在于从这座建筑中走出来的、背着相机的、说着普通话的、甚至金发碧眼的陌生人。

在“博物馆”内，保存着大量资料。据吴馆长说，每年都会有大学教授带着学生来此实地考察，他们走家串户进行访谈并记录每一家的情况，就地整理成档案放入档案室中，也曾经有学者连续居住长达一年以上，拍摄了许多节庆祭祀时的视频资料带回研究中心。

寨老吴世德的孙女阿花是中国药科大学大二的学生，她是我们这次田野调查的“中间人”。在她的叙述中，我们能感受到村民对“博物馆”存在着某种微妙的情绪：在2006年寨里发生火灾之前，地扪的旅游并没有如此惨淡，民宿和旅馆也有十几家，但火灾之后游客数量下降，更重要的是“博物馆”开始对外接待游客——其设施的齐全（我们参观看到，“博物馆”里电脑、洗衣机、洗浴设施都一应俱全），尽管收费为300元/晚（村里民宿和旅馆的价格在80—150/晚之间），可对于来寻找原生态村落但也想保持生活质量的都市人来说，前者更有吸引力。在当地居民的眼中，进驻的“博物馆”其实像一个“冷眼旁观”的记录者、摄像机——甚至村民根本不知道“陌生人”来问的那些乱七八糟的问题究竟有什么意义，他们来了，然后走掉。

在我们临走前，北大医学院的一个团队来到了地扪，住进了“博物馆”。他们全是临床医学大二至大五的学生，由一个老师带队进行为期五天的义诊。在鼓楼的义诊点，村里的小孩子带着好奇的目光来回扫描着这些“陌生人”，以及他们手中的仪器。虽是一个简单的画面，但笔者的心头此刻仿佛被重击——这里的孩子，有没有可能被埋下了志在从医的种子？这个问题一直环绕在笔者的脑海中，或许，他们来了，然后走掉——本就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 三. 建房风波：“原生态”与“改善生活”的困境

2006年4月，地扪寨发生了一次火灾，一村民用火不慎引燃衣被，火势随即蔓延，共有42户233人受灾，死亡1人，直接经济损失43万元。火是侗寨最大的安

全隐患，当地民居分布密集，而且90%以上的房屋都为木质结构，很多吊脚楼都有几十年上百年历史，村民用火大都依靠传统的木炭、柴草等，极易引燃木质房屋。一旦燃烧起来，“火烧连营”的现状可以让村民重回赤贫。侗家人对火灾肇事者有着近乎苛刻的惩罚，他们被勒令三四年内不得回寨，必须在河对岸至少三里之外的地方居住，此外还要花钱举办祭祀土地神的仪式，并请全寨人吃饭。

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和对“不准回寨”的畏惧，将房子建成防火性能更好的砖房成为了寨里人的需求。不仅如此，不少外出打工者成为支持砖房建设的“中坚力量”，他们要建卫浴，要隔音效果更好的空间，而事实上他们也有进行砖房改造的积蓄。然而，当地扪村里30多户人家强烈要求拆掉侗族民族风格的老木房，要求建砖房时，遭到了村委会的反对，此事一直闹到了县里。此后，媒体记者陆续跟进，一次次地将目光聚焦与这个偏远村寨。

交通不便、经济落后这些词或许看起来令人不舒服，但这也正是这些因素使当地的传统文化风俗、生活方式以及生态环境得到了极好的保存，得到了“世外桃源”的美誉，但村民要求改善生活条件的要求，与文化保护之间，似乎产生了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茅贡乡提供的一份《地扪景区乡村建设纲要》里这样描述：“应当唤起社区居民的文化觉醒，增强他们的文化自豪感和自信心……避免现代化和商业化突袭带来的文化突变”、“强调保持侗族村寨的独特个性，引导乡村社区可持续发展，避免损害地方文化的短期利益行为”。由于很多传统民族地区由于发展旅游业带来的消极影响已经被注意到，乡里的干部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不让村民盖砖房，那出了事（失火）咋办？允许村民盖砖房，影响了原生态的人文生态环境，又被扣上一个‘保护传统文化不力’的帽子，我们左右为难。”尽管最后双方达成了妥协：建砖房可以，但在房屋的外面必须用木头装饰成木居的样式，且如果修建砖房，政府不会如同修建木房那样给予补贴。

同在黎平县的另一个侗寨——肇兴——是中国最大的侗寨，其旅游业发展也已经较为成熟，他们的经验是：将年久的木质老房子收回，政府出资让村民在稍微远离寨子的地方修建砖房。收回的老房子在经过修葺后可以通过旅游公司经营成旅馆或者是饭馆。然而，对于旅游经济仍然处于“萌芽”状态的地扪来说，短期内也不可能有资金提供给村民另建房屋。

地扪房屋建设的风波可能只是整个少数民族地区开发旅游资源过程中所遇到问题的一个缩影。或许，还有更好的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那需要时间，更需要智慧。

## 四、结语

在整个西方社会科学诞生的历史中，人们关于社会变迁的思考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因此曼恩会用“身份社会——契约社会”、马克思会用“封建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滕尼斯会用“共同体——社会”、迪尔凯姆会用“机械团结——有机团结”、韦伯会用“宗法传统经济——理性资本主义经济”来描述社会生

活这种断裂性的变化（周晓虹，2012）。然而这些关于社会变迁的描述，或许并不完全适用于一个“社会”外的“社会”，尤其当后一个“社会”处于一种类似于边缘的状态时，这种纵向的维度上的划分，很容易滑向——如学者批评的“传统——现代”两分法一样——文化中心论的观点。

在我们看来，地扪侗寨所面临的机遇也好、挑战也罢，并不理所当然的属于“现代化”的冲击，因为这种判断背后仿佛隐喻着一个重大的误解：“现代”势必是要取代“传统”的。在很多人群社会，包括中国的其他少数民族，我们都能发现文化的湮灭与重整，并呈现出新的形式和内容。

当然，我们并不认为这已经回答了这些民族村落所面临的问题，也并不认为文化的自生自灭是无关紧要的。只有认识到当下转型社会大背景下，外来的冲击可能会对传统村落造成消极影响，带来文化遗产等方面的危机，才会有更多人意识到合理保护之重要性。从更大层面上而言，或许整个转型中的中国所面临的文化困境和心态危机，与地扪一样，有着某种相通之处。

## 鸣谢

在宣告项目圆满完成之时，我们发自内心地对给予我们帮助的老师、同学、当地村民表示感谢。首先要感谢寨老的孙女吴艳花，作为我们在地扪寨进行田野调查的“中间人”，在盛夏顶着烈日充当导游、翻译，带着我们拜访村里的老人，你的热情和细心是我们在这么短时间内能完成调查的重要原因；同样要感谢在实践报告撰写过程中给我们提了诸多建议的褚建芳老师，这篇论文的成型与老师的启发密不可分；感谢团队每一位成员的负责与耐心，没有大家的合力，实践不可能如此顺利地地完成；感谢接受我们采访的每一位村民，尤其是歌师吴胜章和寨老吴世德，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但遗憾由于篇幅和切入角度的限制，许多珍贵的访谈内容未能呈现；木匠老人吴世荣为我们解说了鼓楼的制造过程，造纸手艺人杂妹珠奶奶向我们展示了古法造纸，杂喜艳奶奶——寨子里唯一会唱完整的侗族历史叙述长歌的人——为我们演唱了侗歌……回想起在地扪寨待的一周受到当地村民的款待，仍觉得十分感动。

再次向所有帮助我们的人表示感谢！我们收获很多、成长很多、总结很多，希望这也能成为我们能给你们最好的回报！

## 附：团队介绍

“地扪”田野小分队是一只相当包容的团队，六名成员分别来自社会学院、历史学院、生命科学学院、环境学院和医学院，尽管我们专业背景不同，但却都对我们家乡黔东南的少数民族文化充满了好奇和敬意，因此愿意贡献自己的一技之长完成这次社会实践。团队分工与贡献方面情况如下：



李玉婷（社会学院151080022,15996302097），团队负责人。是社会实践的主设计人、田野调查员，同时负责调查人员的培训；联系指导老师；具体研究方法的制定，以及实践报告的主笔。

欧安特（生命科学学院151140044，15050523607），当地向导、翻译。负责联络当地的同学，充当向导；田野调查员，同时将录音文件翻译和整理成访谈记录。

张家伟（环境学院151200081，13638062334），摄影师、田野调查员；负责摄录设备的采集和保管，并承担宣传工作。

何影（历史学院151020024，15985519909），负责历史文献收集和整理，档案分析；撰写实践报告的历史资料部分内容。

夏锦坤（医学院151230038，13951723968），负责制作账单，管理团队资金，开源节流；田野调查员。

马泽坤（生命科学学院151140042，13505289711），视频和图片的后期编辑，团队的后勤工作。

## 参考文献

- [1]张珊、贵州地扪侗寨的历史地理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09、
- [2]曹端波、侗族传统婚姻选择与社会控制[J]、贵州大学学报，2008，26（2）：60~65、
- [3]刘宗碧、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传承机制的当代变迁及其因应问题——以黔东南苗族侗族为例[J]、贵州民族研究，2008，28（121）：160~166、
- [4]王良范、文化境域中的诗性象征——侗族鼓楼的美学人类学解读[J]，贵州大学学报，2002,16（34）：47~52
- [5]石开忠、试论侗族的来源和形成[J]，贵州民族研究，1993：2
- [6]廖君湘、南部侗族传统文化特点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06：23
- [7]尤小菊、民族文化村寨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以地扪生态博物馆为个案[J]、贵州大学学报，2010,28（3）：111~117、
- [8]周晓虹、“中国经验”与“中国体验”[J]、学习与探索，2012：3：31~33、